

# 商代青铜神秘纹样

## ——“人虎母题”新论

□ 卢 昉

在中国古代美术中,经常可以见到人虎母题的装饰风格。商周时期,我们看到的人虎符号具有比较丰富浓厚的宗教气息。其中最著名的两件虎食人卣(图一)和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就表现出了某种人虎紧密相依的神秘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虎母题便成为商周青铜器中极为引人注目的装饰纹样,其含义及象征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关于人虎母题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象征意义上,其着眼点在猛虎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身份。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早期做过较多解释的是张光直先生。他是萨满通灵说的代表<sup>[1]</sup>。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虎母题是商周时期巫觋中的某些动物与鬼神相通现象的物质表现。在商周神话美术中所见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动物的功能往往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灵世界的沟通上的,人虎母题表现的是巫师与其动物“助理”的关系<sup>[2]</sup>,器物上的人很可能是做法通天的巫师,他与熟悉的动物在一起,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帮助他上宾于天。张先生指出,这种表示两者密切及互相依赖关系的人虎母题,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一直到青铜时代,都是中国古代艺术里一个连续出现的母题<sup>[3]</sup>。由于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识水平也相对落后,因此把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神力。人们对神灵充满敬畏之心。人们乞求神灵,取悦神灵,借助神力以支配事物。“可以通神”的巫师有着极高的地位,巫师阶层成为最初的帝王统治阶层。祭祀是巫师的特权,也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巫师们利用青铜器上的动物与神灵交流,因此,动物纹样也代表着某种神秘权力。

巫鸿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威吓说。他认为,人虎母题青铜器是一种“人祭”(伐祭)图像。

“人”是奴隶或囚犯等被统治阶级,食人者则是奴隶主祭祀的神灵,或为奴隶主祖神的象征<sup>[4]</sup>。商周时期,青铜器已成为王权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国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商周统治者用这种人虎母题纹饰的狰狞恐怖来表现王权的神秘威严,以表达其对政权、地位及财富的占有。奴隶主在这些恐怖狰狞的纹饰中寄托了他们全部的威严、意志、荣贵、幻想和希望。此后,马承源先生又提出辟邪说<sup>[5]</sup>。认为“人”是鬼魅,人虎母题则意在辟邪。与此相近的观点是何新先生的虎神食鬼说<sup>[6]</sup>。何新先生认为,虎表示由虎方——徐、巴国图腾演变而成的虎食茶,“虎所食人者,虽具人形,但形象狞厉,周身绘有怪纹——应该是鬼魅的象征”。刘敦愿先生在肯定虎为东方夷国图腾——虎神的前提下,对人虎母题也做出了一些解释<sup>[7]</sup>。他认为,人虎母题的含义可能为:a.表示国运兴旺,战功赫赫,威服百蛮。b.表示以人牲奉献牺牲。c.表示铸造者是虎神的子孙,应该受到虎的福佑。d.



图一 虎食人卣(现藏于法国赛努施基博物馆)

表示猛虎吞人。e.表示虎为人哺乳或交媾。李学勤先生在 80 年代晚期曾对一些人虎母题青铜器作过分析,并提出了“神人合一”说,认为该类青铜器象征人类自我与拥有神性的虎的合一<sup>[8]</sup>。

上世纪 90 年代,以徐良高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彰显军威说。徐先生认为,人虎母题纹样中“人”的形象基本上是铸器者的敌方——羌人形象。人首表示俘虏的首级,整个构图表示器物的持有者克敌制胜的巫术用意<sup>[9]</sup>。该观点认为,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人虎母题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图腾崇拜的承续。猛虎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是早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90 年代后期,徐先生再次对人虎母题之威势作了探讨,其中也包括对人虎母题含义的分析<sup>[10]</sup>。

上述观点的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都认为人虎母题表现的是一种人力以外的神秘力量,二是在论证其含义时,都将不同功用,甚至不同时代的器物混为一谈,虽有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仍存在偏颇。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人虎母题青铜器,它们时代不一,出土地点也分布较广。因此,除了解析人虎关系所蕴藏的含义外,这些青铜器本身的发展演变也很值得研究。这对探索此类青铜器的产生源流,进而揭示商周时期各地青铜文化的面貌和相互关系很有启示。

人虎母题之图案装饰见于青铜礼器,最早应是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山东龙山文化的人面纹大玉刀。这种大玉刀的形制与龙山文化的穿孔石刀相似。不同的是,该玉刀在一侧刻划了一个戴冠披发、面目威严的人首;其后刻划有一怪兽做欲吞噬一戴冠人首之像。其主题与副主题形成了一幅奇特而又动静结合的形态造型。该玉刀具有强烈的装饰意趣,很显然,它非实用器,在当时应该是象征神圣王权的礼器,与出自山东日照两城镇的两件兽面纹玉斧应具有相似的功能<sup>[11]</sup>,时代均距今约 4500 年。

商周青铜礼器中的兽面纹,是现实世界中各种动物的综合衍变体,其中虎的形象最有代表性,这在弗利尔龙山玉刀刻纹上也得到了一定验证。在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中,尚未见到人虎母题的艺术造型,但是有不少兽面纹见于玉柄饰和铜牌饰之上,其中不乏类似虎的纹饰。同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礼器上的兽面纹也有似虎形象。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的年代都在距今 4000~3500 年,在时代及文化发展序列上处于龙山文化与商代中期



图二 神人兽面纹

文化之间。

到了商代中晚期,中国的早期国家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虎母题艺术造型也更多见于青铜礼器、兵器之上,著名的虎食人卣诸器就是其典型代表。“周因与殷礼”,西周早期人虎母题仍见于各种装饰,但到西周中期以后,人虎母题就开始衰变了,之前较为常见的人虎一体衍变成了人虎组合或人抚兽的亲昵造型。如洛阳西郊东周墓就出土过伏兽玉人,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的刻纹铜器上,都有人戏兽的图像。

笔者认为,人虎母题的艺术造型,很有可能最先应该肇始于山东龙山文化,其后由商文化继承发展,盛行于商末周初,而后逐渐衰变乃至绝迹。商代虎食人卣诸器上的人虎母题,估计就是龙山文化礼玉怪兽食人图像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人虎母题在商周时期才有明确的表现,但过去的传世玉器上也见到过人形与兽形发生关系的图像。以动物(尤其是虎)为通天媒介的宗教观念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并不罕见。在距今 5000~4000 年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那些形制复杂、精美绝伦的玉器,其中以“两眼一嘴”为特征的所谓“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纹饰。1966 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高 8.8 厘米,宽 17.6 厘米,重达 6.5 公斤的大玉琮,被一些学者喻为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在这件玉琮上刻有十分清晰的“神人兽面纹”<sup>[12]</sup>(图二),这一神人兽面纹乃复合像,上部是神人的脸面,头戴羽冠,威风凛凛,圆脸、宽鼻、阔

嘴;下部是似虎的兽面,椭圆形眼、宽鼻、阔嘴,图案线条清晰,栩栩如生,似鬼斧凿成,如神功刻就。

在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器物上,均可见到兽面下部具盘腿双足而上部无神人的图像,很难想象良渚先民在简化“神人兽面纹”时,只将神人的上身省略而单单详尽地保留神的腿部。“神人兽面纹”上肢为五指平伸的人手形象,而下肢的脚却呈指甲长利的爪形,这也说明二者显然不是一体。其实,“神人兽面纹”的上部为头戴羽冠的人形,这应当是当时的巫师或酋长形象的写实。呈现三爪鸟足状的“下肢”应当是兽的前肢,而所谓“带腿的兽面纹”实际上是兽趴伏时的正面形象。反山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实际上是巫师骑于趴伏的神兽身上,双手扶住兽头两侧的正面造像,其含义很可能是巫师以兽为通天坐骑,乘之往返于天地之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良渚琮王上兽面的圆形大眼、獠牙外露(犬齿发达)以及爪甲尖利都是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我们应该注意到,长吻食肉动物(如狼等犬科动物)的正面形象,其嘴唇部分往往显得很小,只有短吻的食肉动物(如虎等猫科动物)的正面形象才有“神人兽面纹”所刻划出的那样的大嘴。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的兽面部分变形较小,兽的额部有横纹,口两侧有须,形象酷似现今工艺美术品布老虎的头像<sup>[13]</sup>。在所有的食肉动物中,虎是对人类思想意识影响最深的动物之一。新石器时代及商周的文化遗存反映人虎关系的材料比比皆是,后世与良渚“神人兽面纹”含义基本一致的器物上的兽面更是经常表现为虎。古生物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太湖流域确有虎生存。由此推断,良渚兽面纹很可能就是虎的正面头像。所以说,琮王上装饰的“神人”和兽面组合纹饰已明确地告诉我们,“神人兽面纹”应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图像的上部为神人,下部为兽;兽面下部那极度弯曲的腿不是“神人”的,而是兽的。另外,这种纹饰很可能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人虎母题纹饰的渊源。

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经过较晚的良渚文化,一直到青铜时代,中国古代艺术里面有过一个连续出现的重要母题,即人虎母题。有的人形在上方或占笼罩地位,有的在下方或处于附庸地位,也有的人虎各在器物一面。从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资料来看,自仰韶到魏晋这5000年间,一直有人虎母题的存在,只是过去我们没有把它的意义把握清楚罢



图三 妇好钺

了。

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人虎母题青铜器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和中原地区。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均有发现。出土地点的集中区域在各期略有不同,而各地之间或许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动物与人的相斗是我国神话美术中常见的题材之一,这类题材的源头虽可以追溯到中原,但只有商周时期的荆楚地区发育完备。秦汉时期,这一题材遍及全国。一种模式固定、影响面广、延续时间长的美术题材,在文献中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虎食人虽不见记载,但饕餮食人,穷奇食人说明了人被食传说的存在。另外,人御或驭龙、虎、凤之说亦随处可见。

从我们发现较早的阜南尊和三星堆尊来看,与同时期的中原尊相比,这两件南方尊的装饰纹样比较特别,其腹部饰人虎母题纹,肩上为游龙。这与腹部饰兽面纹,肩上多为兽首的同期中原尊不同。类似的人虎母题在中原同时期的其他器上尚未发现,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在所余的人虎母题铜器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皆出自中原地区。传世的铜器中除人虎母题饰件较特别外(传出自湖南),其余的戈、钺和车器等也都和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因此可推断他们为中原铜器。在这些中原铜器中,只有4件为商代器,即司母戊鼎和妇好墓钺为殷墟二期器(图三),其余的有胡三角援戈和人虎母题饰件与鼎、钺同时或稍晚。西周铜器中,浚县刀和2件铜钺最早,为西周早期。茹家庄等地出土的车軑为西周中期器。虢国墓地和应国墓地出土的车害最晚,为西周晚期器。从器



类来看,这组器仅司母戊鼎为礼器,其余全是车器或兵器。同时,中原铜器上的人虎母题母题也发生了变化。像虎食人卣那样直接以人虎母题为器形的器物已不见,而只存在人虎母题纹,且人虎母题纹又基本不见全躯,或省略人身,或省略虎身,到西周中晚期时仅有一人头和虎头,而且许多人虎母题纹只施于器物的次要位置。

在殷墟铜器中,司母戊鼎的人虎母题纹仅在鼎耳上出现,它和妇好钺上的纹饰一样,都是两虎结合一人头,人身已被省略,并且妇好钺上的虎纹已开始变形。在伦敦收藏的有胡三角援戈上,虎只突出刻划了眼和鼻,已无大口,人也不再写实,母题中人和虎的关系亦不如之前亲密。在西周铜器中,浚县刀的虎身变得很像龙身,人也只有一个侧身像。茹家庄所出的几件车軛上,人和虎被组合在一起表现。可见,在西周的兵器和车器中,除藏于伦敦的车軛和虢国、应国墓地的西周晚期车軛外,人虎组合多已不再为紧密结合状。

南方出土的铜器和中原铜器上人虎母题的不同特点及相互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青铜器上的人虎母题最早是出现在礼器上,从西周开始基本只见于兵器及车器之上。早期的母题中人和虎都被全躯刻划,是器物的主要纹饰,后来其形象逐渐抽象变形,或省略人身、或省略虎身,最后人和虎都仅表现出其头部,并成为一种远不如早期突出的装饰。早期的人虎关系比较紧密,而晚期的人和虎则逐渐疏离,人虎之间没有发生直接关系。



图四 商代青铜人面方鼎(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图五 青铜立人像(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笔者认为,中原青铜器上的人虎母题应是接受了南方青铜器的影响。在中原殷墟晚期以前的青铜器中,人和虎的造型装饰似不如南方丰富。从前述的这些中原铜器看,人虎母题纹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扁平脸,浓眉大眼,圆鼻头,大耳,突唇,披发,这些特征与湖南出土的人面纹方鼎(图四)上的人面以及三星堆的部分人物造型(图五)十分相近。另外,早期的人虎母题纹上普遍多见鳞纹,而鳞纹在南方出土的青铜器上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湖南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铜器中时常出现,是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纹饰之一。

在中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内,历来就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这些铜器是由中原流传到南方或者是完全接受中原铜器的直接影响而出现的,因而将这些铜器置于中原铜器的发展序列下进行分析和研究。但南方地区除零散铜器外,在湖南、皖南以及近年来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都出土了大批重要铜器,这些发现多少改变了以往我们对南方青铜器的认识。许多南方铜器的时代并不比中原晚,有的可能早到二里冈时期,多数相当于殷墟和西周早期。不少器物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并与中原青铜器存在明显区别。因此,南方青铜器应存在一个自身的演变过程,

它们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在目前发现的南方出土的人虎母题青铜器中,阜南尊时代最早,湖南和四川出土的卣和尊则时代稍晚。因此,在南方青铜器的系列内部可能还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影响。

人虎母题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冈时期便已在南方青铜器上出现,以后则多见于南方相当于中原殷墟早期、中期的铜器上,此后这一装饰母题在南方逐渐消失。大约也是在殷墟早中期时,这一装饰母题传入中原,在司母戊鼎、妇好钺等器上出现,表明当时这一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当人虎母题在南方已消失后,却在北方地区一直流传到西周末期,说明这一来自南方的影响亦有很强的延续性。从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来看,该母题向北首先到达河南浚县和安阳一带,随后向西传播,直至陕西宝鸡。而且自河南安阳以西后,所发现的人虎母题铜器的时代都为西周。可见,人虎母题在中原亦呈自东向西流传的趋势。

尽管中原青铜器对南方青铜器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中原和周边地区青铜文化间的交流及影响是相互的,只是由于中原文化更为发达强大,它所传播出去的文化因素更容易为周边文化接受并加以改造,成为自身的主导文化因素,但与此同时,周边文化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原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也有可能进入到中原地区的文化氛围内。如前文对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分析不误,那么这便是南方青铜器对中原铜器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

南方出土的人虎母题铜器普遍早于并有别于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人虎母题青铜器应起源于南方。此外,在中国南方出土的铜器当中,人、虎的造型纹饰还有不少。如新干大洋洲的铜虎和铜人像,湖南的人面纹方鼎和各类伏虎、虎纹,广汉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人面具等,这些都构成了南方青铜器的传统,从长江上游到长江下游都发现过人虎母题铜器也正说明它是南方青铜器共有的一个特点。若对商周时期人虎母题青铜器作更深入的分析,不仅对该类主题纹饰本身的涵义和流变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南方青铜器的面貌和探讨南北方青铜器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人虎母题是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的。人和虎的关系密切、形象写实,在器物上的位置也十分突出,随着它传到中原地区,特别是到了西周时期,

这种母题基本上已从礼器移植到了兵器和车器上,并且人虎关系不再密切,装饰地位也不再突出。那么,这一变化能说明什么呢?

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首先应该从人虎母题的内涵考虑。其实,不论人虎母题体现的是人神世界的沟通、动物与巫师的关系,还是人界与神界的合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原始宗教思想的反映,是一个时代人文思想的反映,是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

[3] 张光直《濮阳三躄与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人虎母题》,《文物》1988年11期。

[4] 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美术研究》1979年1期。

[5]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6] 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7] 刘敦愿《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江汉考古》1985年2期。

[8] 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9] 徐良高《商周青铜器“人虎母题”纹饰考释》,《考古》1991年5期。

[10] 徐良高《从商周人像艺术看中国古代无偶像崇拜传统》,《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1] 同[4]。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13]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

(作者工作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